

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的关系及其本土化发展*

李永强 黄 姚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成都 631110)

摘 要 在综合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间关系的文献后发现, 以往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以往研究欠缺对中介机制、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以及个性特征对社会网络交互作用的探索; 缺乏双向共变动态视角; 对中国情境下应该被关注的人格特质重视不足, 尤其缺少基于中国人人格与圈子的系列研究。基于本土化的人格理论和社会网络研究成果开展研究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着重从完善现有研究框架、二者关系研究的本土化、探索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的共变关系等方面来开展研究。

关键词 社会网络; 个性特征; 大五人格; 圈子; 中国人人格

分类号 B849:C91

1 研究缘起与概述

社会网络已经成为并将继续作为新兴的和发展中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所跨学科包括组织理论、组织行为、战略管理、商业研究、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公共管理、社会学、信息交流、心理学(Provan, Fish, & Sydow, 2007)以及营销学等。以往许多研究都认为社会网络特征与工作满意度(Roberts & O'Reilly, 1979; Morrison, 2002)、权利(Brass, 1984; Blau & Alba, 1982; Krackhardt, 1990; Brass & Burkhardt, 1992)、工作获得(Granovetter, 1982; Lin, Ensel, & Vaughn, 1981; Marsden & Hurlbert, 1988; Wegener, 1991)和绩效(Mehra, Kilduff, & Brass, 2001; Cross & Cummings, 2004; 白璇, 李永强, 赵冬阳, 2012)息息相关。此外, 晋升(Seibert, Kraimer, & Liden, 2001)、辞职行为(Krackhardt & Porter, 1985, 1986; Tsui & O'Reilly, 1989; McPherson, Popielarz, & Drobnic, 1992)、领导能力(Brass & Krackhardt, 1999; Sparrowe & Liden, 1997)和非道德行为(Baker & Faulkner, 1993; Raab &

Milward, 2003)也会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

学界虽然已经在社会网络特征的结果变量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社会网络特征前因变量方面仍存在许多有待探索的问题。社会网络分析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结构与结构形成过程的细微差异上, 却忽略了镶嵌在网络内的个体个性特征(Burt, Jannotta, & Mahoney, 1998)。Burt 等(1998)大胆假设社会网络位置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关于人格的函数。社会网络的相关研究不应该忽略影响社会网络特征形成的心理因素。在以往文献中, 引入到社会网络领域关于个体特性的理论主要有个性心理特征理论(psychological trait theory)和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本文重点关注个体个性特征对社会网络关系特征与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围绕这一核心话题, 我们将回顾评述关于个体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间关系的有限文献, 并结合中国人人格、圈子等本土化研究成果展望二者关系的本土化研究方向, 同时从复杂性理论与人格发展模型入手探索个体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的共变关系。

2 文献回顾与评述

2.1 综述框架

正如 Ginsberg 和 Venkatraman (1985)所说, 要想从众多差异较大的研究成果中系统地辨识出主要研究模式, 并评价特定的研究做出的贡献, 必

收稿日期: 2014-03-21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072170、71372208)、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2-0923)和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JBK120503、JBK1307145)支持。

通讯作者: 李永强, E-mail: liyq@swufe.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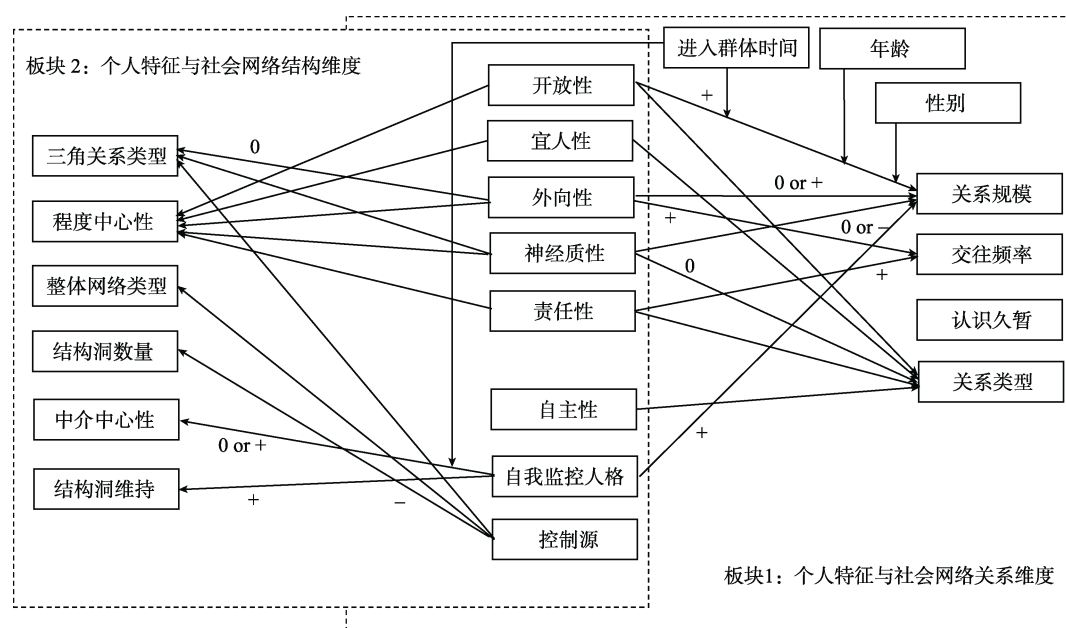


图1 综述框架

注：0 表示变量之间关系不显著；+表示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示变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没有标识的实线表示关系无法简单描述，请参见表1和表2中的具体内容

须有一个适用于分析的综述框架。图1整合汇总了人格特质、自我监控人格、控制源等对社会网络关系维度与结构维度影响的研究结论，详细描绘了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把框架中所列的关系分别归类为板块1和板块2。板块1主要探索个性特征对社会网络关系维度的影响。板块2则主要探索个性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维度的影响。其中，人格特质各维度的确定既参考了艾森克人格量表(EPI)，又参考了大五人格量表(NEO-FFI)。

在对相关的10余篇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对社会网络关系维度产生影响的人格特质主要有外向性人格(extraversion)、神经质人格(neuroticism)、责任心人格(conscientiousness)。而对社会网络结构维度产生影响的心理因素则主要包括自我监控人格(self-monitoring)、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以及人格特质中的开放性人格(openness)和神经质人格。外向性主要表现为热情、喜爱社交、果断、活跃、冒险、乐观等特质；神经质包括焦虑、敌对、压抑、自我意识、冲动、脆弱等特征；责任心人格显示出胜任、公正、条理、尽职、成就、自律、谨慎、克制等特质；开放性人格则体现为想象、审美、情感丰富、求异、创造、智能等特

质(McCrae & Costa, 1987)。高自我监控人格的个人具有随着环境以及交往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行为的倾向，并喜欢嵌入不同的网络，且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扮演不同的角色(Snyder, Gangestad, & Simpson, 1983)；控制源反映了个人关于环境把控的信念是自我归因还是外部归因(Rotter, 1966)。

另外，社会网络关系维度可以用关系规模、关系强度和关系类型来进行描述，而对结构维度则可以用中心性、结构位置以及密度来体现。关系规模指人与人之间关系连带的数量。关系强度则通过互动频率、认识久暂、亲密程度来测量(Granovetter, 1973; Russell, Booth, Reed, & Laughlin, 1997)。中心性评价了一个人重要与否(罗家德, 2010)，包括程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三种。程度中心性指的是在社会网络中，一个行动者(actor)与很多其他行动者有直接联系，该行动者就处于中心地位，从而拥有较大的权力。中介中心性测量的是行动者对资源信息控制的程度，如果一个行动者处于许多交往网络的路径上，可以认为此人居于重要的地位，因为他具有控制其他两人之间交往的能力。接近中心性是行动者不受他人控制的程度，行动者越是接近其他人，

在信息传播中越不依赖他人。结构洞是指 A、B、C 网络中, 如果 AB 之间有关系, BC 之间有关系, 而 AC 之间没有关系, 且 A、C 掌握着不同的资源或占据不同的结构位置, 则 AC 就是一个结构洞(structure hole)。AC 结构洞的存在表明, AC 如果要发生联系, 必须要通过 B, B 就是 AC 的“桥”(bridge)。

2.2 文献回顾

此部分按照综述框架划分的板块详细介绍了各板块现有研究的结论与不足。每项研究按照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与方法、测量的主要变量、主要发现四个维度进行归类, 结果如表 1、表 2 所示。表 1 归纳了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关系维度间关系的研究内容, 表 2 则涵盖了个性特征与结构维度间关系的相关文献。

2.2.1 板块 1: 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关系维度之间的关系

Vaux (1988)认为社会支持应该被看作一个二阶的或多元的构念。社会支持的一阶构念就是社会网络, 即个人与他人关系的真实特征, 包括下列维度: 关系规模(size of network)、社会交往频率(frequency of social contact)以及网络构成(network composition)。人格特质会对真实的个人社会网络特征和个体对关系特征的感知能力同时产生影响。现有研究中, 一些研究试图直接探索人格特质对真实的个人社会网络关系特征的影响(Asendorpf & Wilper, 1998; Kalish & Robins, 2006; Roberts, Wilson, Fedurek, & Dunbar, 2008; Bosker, Doeven-Eggens, de Fruytb, Hendriks, & Van der Werf, 2008); 也有另外一些研究在探讨人格特质对其他变量的影响时, 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Bolger & Eckenrode, 1991; Swickert et al., 2002; Russell et al., 1997; Stokes, 1985)。

在心理学领域社会网络特征作为中介变量被引入到探索人格特质对压力(Bolger & Eckenrode, 1991; Swickert et al., 2002)、嗜酒(Russell et al., 1997)、孤独感(Stokes, 1985)影响的问题中。Bolger 和 Eckenrode (1991)认为社会关系对压力在精神健康上的影响有缓冲的作用, 而人格影响个体所感知到的社会关系。Swickert 等(2002)用实证研究验证了关系规模、社会接触对外向性人格与压力(stress)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Stokes (1985)也得出类似结论: 外向性人格对孤独感的影响作用会被

社会网络特征部分中介。

在直接影响网络形成的个性特征中最受研究者关注的就是人格特质。Asendorpf 和 Van Akin (1994)率先开始研究人格特质对关系状况的影响, 并发现外向性和责任性两种人格特质对社会网络关系特征有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会随着关系建立的时间长短而发生改变。但是关系状况不会使人格发生改变(Asendorpf & Wilpers, 1998)。Kalish 和 Robins (2006)进一步探讨了外向性人格、神经质性人格、自我监控人格、控制源对个人关系连带数量、个人网络位置的影响。此后, Roberts 等(2008)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网络中最靠近中心且最亲密的层面: 支持型小团体(support clique)与情感型群体(sympathy group)。其研究发现外向性人格与支持性小团体规模有关, 但是与情感型群体规模无关, 神经质性人格与两种群体的规模都不显著相关。这是首次有研究者根据某些特征将其所研究的社会网络进行分类, 并按网络类别来探索人格特质对社会网络特征的影响。人格也会影响个人的关系类型偏好。Bosker 等(2008)将个人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家人导向型关系、朋友导向型关系以及混合型关系)进行研究, 发现不同人格特质的人对于三种关系类型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Pollet 等(2011)探索了外向性人格个体与群体内成员的情感亲密水平, 发现外向性人格与亲密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归纳板块 1 可得出以下结论: (1)相较于低外向性人格的人而言, 高外向性人格的人更加热情主动, 寻求与更多的人接触, 更喜欢社交活动(Bouchard, Lussier, & Sabourin, 1999)。因此, 在各种网络类型中外向性人格都与关系规模正相关, 且能很好地预测个人的关系规模。年龄和进入某群体的时间会对这一影响起到调节作用。(2)高外向性人格个体具有更高超的社交技能, 更偏好社会互动(王登峰, 崔红, 2004), 与社会网络内其他成员的交往频率更高。(3)神经质性人格对关系规模的影响存在相异的实证研究结论。焦虑与强迫症使得高神经质性人格个体不受欢迎(Sangster & Ellison, 1978)。高神经质性个体常常会认为自己被排挤, 觉得自己是不被接纳的。因为害怕被拒绝, 他们会主动拒绝与他人建立关系来进行自我保护(Stokes, 1985)。心理学家普遍认为神经质性人格与关系规模负相关(Stokes, 1985; Sarason,

表 1 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关系维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成果/联系	研究样本	数据来源与方法	测量的主要个性特征变量	测量的主要社会网络特征变量	结论
Stokes (1985)	97 名男本科生 82 名女本科生	问卷调查	外向性人格 神经质人格 自我开放人格	关系规模 社会关系中亲密者数量	① 关系规模是外向性人格与孤独感的中介变量 ② 亲密者数量是外向性人格与孤独感的中介变量 ③ 亲密者数量是自我开放性 & 孤独感的中介变量 ④ 神经质人格与关系规模、亲密者数量无关 ⑤ 关系规模、亲密者数量与外向性人格正相关 ⑥ 自我开放性 & 亲密者数量正相关
Bolger & Eckenrode (1991)	99 个学生	问卷调查	外向性人格 神经质人格	社会联合	① 外向性人格与社会联合正相关, 并对社会压力在心理健康上的影响产生缓冲作用 ② 神经质人格对压力的感知的影响与社会网络特征无关
Russell 等(1997)	294 个男酗酒者	问卷调查 结构访谈	外向性人格 神经质人格	关系规模 交往频率 负连带数量 正连带数量 亲密关系数量 关系多样性	外向性人格与关系规模正相关 外向性人格能有效预测关系规模(+) 外向性人格与交往频率正相关 外向性人格与亲密者数量正相关 外向性人格能有效预测交往频率(+) 神经质人格只与正连带数量呈负相关关系
Asendorpf & Wilpers (1998)	109 个学生	纵向问卷调查	外向性人格 神经质人格 责任性人格 宜人性人格 开放性人格	关系规模 交往频率 冲突数量 认识久暂	① 外向性人格可以有效预测关系连带数量(+), 但是随着进入新环境时间的延长外向性人格的预测作用降低甚至消失 ② 宜人性可以有效预测与异性伙伴的冲突频率(-) ③ 责任性可以有效预测与亲人的交往频率(+)
Swickert, Rosentreter, Hittner, & Mushrush, (2002)	99 个学生	问卷调查	外向性人格 神经质人格	关系规模 交往频率 认识久暂	① 关系规模对外向性和压力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 ② 接触频率对外向性和压力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 ③ 外向性人格可以很好地预测关系规模与接触频率 ④ 神经质人格与网络特征无关
Kailsh 等(2006)	127 个心理学学生	纵向问卷调查	外向性人格	关系规模	① 外向性人格与关系规模正相关
Robers 等(2008)	176 个英国社区居住者	邮寄问卷调查	外向性人格 神经质人格	支持型关系规模 情感型关系规模	① 外向性人格对支持型网络规模有正向影响, 但年龄对这一影响有调节作用 ② 外向性人格对情感型网络的规模没有影响 ③ 神经质人格对两种网络的规模都无影响
Bosker 等(2008)	92 个学生	实验法(角色扮演)	外向性人格 神经质人格 责任性人格 宜人性人格 自主性人格	网络类型(亲人主导、朋友主导、混合型)	① 高外向性人格的个体与低外向性人格的个体相比, 对家人导向型网络的偏好更低 ② 高自主性人格的个体与低自主性人格的个体相比, 对家人导向型网络的偏好胜过朋友导向型网络 ③ 高自主性人格的个体与低自主性人格的个体相比, 对混合导向型网络的偏好胜过家人导向型网络 ④ 高责任性人格的个体与低责任性人格的个体相比, 对家人导向型网络的偏好胜过混合导向型网络 ⑤ 神经质人格与个体偏好的网络类型无关
Pollet, Roberts & Dunbar (2011)	117 个荷兰人	问卷调查	外向性人格	关系规模 情感亲近程度(将网络规定为支持型小群体和情感型群体)	每个网络层面的规模都与外向性人格有正向关系 外向性人格与情感亲密程度负相关 外向性人格对女性的关系规模影响大于对男性的

表 2 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结构维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成果/联系	研究样本	数据来源与方法	测量的主要个性特征变量	测量的主要关系网络特征变量	结论
Burt 等(1998)	MBA 学生	问卷调查	控制源(内控-外控)	结构洞的数量 网络束缚	不同内控程度的个体拥有不同的网络结构，虽然只有少量内控的测量条目对网络位置变化有影响，但累积解释度非常高 内控程度对占取结构洞的动机有显著影响 个人内控人格得分越高，网络对个人的束缚越小，结构洞越少 高内控个人容易拥有创业型网络；中内控个人倾向于拥有小群体网络；低内控个人则拥有层级网络
Mehra 等(2001)	92 个员工	问卷调查	自我监控人格	关系规模 中心性	① 在朋友网络中，自我监控人格对中介中心性有正向影响 ② 在工作网络中，自我监控人格对关系规模有正向影响，对中介中心性却没有作用 ③ 个体参与组织的时间长短对自我监控人格与中介中心性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时间越长，关系越显著
Klein, Lim, Saltz, & Mayer (2004)	2 个当地的工作组，每组 9-12 人	纵向问卷调查 分析方法为 HLM	外向性人格 神经质人格 宜人性人格 责任性人格 开放性人格	朋友网络的程度中心性 咨询网络的程度中心性 反对者网络的程度中心性	外向性人格、宜人性格、责任性人格与咨询网络的程度中心性不相关 神经质人格与咨询网络的程度中心性负相关 外向性人格与朋友网络的程度中心性不相关 宜人性格与朋友网络的程度中心性正相关 责任性人格与朋友网络的程度中心性负相关 开放性人格与朋友网络的程度中心性负相关 神经质人格与反对者网络的程度中心性正相关 宜人性格与反对者网络的程度中心性负相关 开放性人格与反对者网络的程度中心性负相关
Brass, Galaskiewicz, J Greve, & Tsai (2004)		二手资料	人格	个人网络特征	人格会对个人网络特征产生影响
Kalish & Robins (2006)	127 个心理学学生	纵向问卷调查	自我监控人格 外向性人格 控制源(内控-外控) 神经质人格	9 种类型的三角关系(triad)数量(SSS、WWW、SNS、WNW、SSW) 关系规模 网络密度 网络效率 网络束缚	① 外向性人格与关系规模、网络密度、网络效率正相关 ② 内控型人格与网络束缚负相关 ③ 外向性人格对个人网络中 WWW 类三角关系数量有负向影响 ④ 外向性人格对个人网络中 SSS 类三角关系数量有正向影响 ⑤ 神经质人格对个人网络中 SSS 类三角关系数量有正向影响 ⑥ 神经质人格对个人网络中 WWW 类三角关系数量有负向影响 ⑦ 控制源对个人网络中 WWW、WNW、SSW 类三角关系数量有正向影响
Oh & Kilduff (2008)	162 个商人	邮寄问卷调查	自我监控人格	直接中介位置的数量 间接中介位置的数量	高自我监控人格的人占有更多直接中介的位置 进入该群体时间的长短对高自我监控人格在其他网络中的被接受度起调节作用
Sasovova, Mehra, Borgatti, & Schippers (2010)	170 个员工	纵向问卷调查	自我监控人格	结构洞的动态变化： 新结构洞数量 结构洞的维持时间	① 高自我监控人格的个体能够创造更多新的结构洞 ② 高自我监控人格的个体维持结构洞的时间更长

Levine, Basham, & Sarason, 1983; Bolger & Eckenrode, 1991; Russell et al., 1997)。但是, Henderson (1977)的研究发现神经质人格与社会连接、依恋的获取正相关。

2.2.2 板块 2: 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结构维度之间的关系

组织动力学的结构途径更倾向于将重点聚焦在社会空间中各位置的结构上, 回避了行动者(actor)心理特征的测量。Burt 等(1998)率先开始探索个体内控倾向与组织束缚感、个人中心网中结构洞数量之间的关系, 并发现虽然只有少量自我管理的测量条目对网络位置变化有影响, 但对位置变化的累积解释度很高。个体内控倾向也对个人占取结构洞的动机强度有显著影响。内控人格得分越高, 网络对个人的束缚越小, 网络中存在的结构洞越少。并且, 高内控个人容易拥有企业家网络(entrepreneurial network); 中内控个人倾向于拥有小群体网络(clique); 低内控个人则拥有层级网络(hierarchical)。这三个网络主要按照扁平化—阶层化(flat-hierarchical)、密集—稀疏(dense-sparse)两个标准进行划分。企业家网络结构扁平且稀疏; 小群体网络结构也趋于扁平, 但是网络结构密度高; 而层级网络结构稀疏, 且阶层化明显。

随着对结构洞的深入研究, 研究者们发现自我监控人格与结构洞的占取显著相关(Oh & Kilduff, 2008; Kalish & Robins, 2006; Mehra et al., 2001)。Kalish 和 Robins (2006)将个人关系网络中的三角闭环关系分为 9 类: SSS (ABC 三者之间都为强连带)、SWS (AB、AC 之间为强连带, BC 之间为弱连带)、SNS (AB、AC 之间为强连带, BC 之间无连带)、WSW (AB、AC 之间为弱连带, BC 之间为强连带)、WWW (ABC 三者之间都为弱连带)、WNW (AB、AC 之间为弱连带, BC 之间无连带)、SSW (AB 之间为弱连带, BC、AC 之间为强连带)、SWW (AB、BC 之间为弱连带, AC 之间为强连带)以及 SNW (AB 之间为弱连带, AC 之间为强连带, BC 之间无连带), 并探讨了外向性人格、神经质人格、控制源(内控—外控)、自我监控人格对个人网络中各类三角关系所占百分比的影响。

Oh 和 Kilduff (2008)发现高自我监控人格的个体更容易占据网络中直接和间接中介的位置。Mehra 等(2001)则社会网络分为朋友网络和工作网络, 进而分别探讨了自我监控人格在两种网

络中与中介中心性的关系。Klein 等(2004)则研究了大五人格分别对朋友网络、咨询网络和反对者网络程度中心性的影响。唯一关于结构洞动态变化的研究是 Sasovova 等(2010)进行的。他们采用纵向研究设计, 通过对长期问卷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发现自我监控人格与结构洞的变化显著相关。

归纳板块 2 也可得出以下两个主要结论: (1)以往多数研究认同了自我监控人格对中心性的正向影响(Sasovova et al., 2010; Oh & Kilduff, 2008; Kalish & Robins, 2006; Mehra et al., 2001); (2)自我监控人格与结构洞的占取和维持有正相关关系(Oh & Kilduff, 2008; Kalish & Robins, 2006; Mehra et al., 2001)。自我监控人格理论认为, 由于高自我监控人格的个体对于成功的社会交流具有更强的动机, 所以他们更容易从与不同人的交往过程中获益(Ickes, Holloway, Stinson, & Hoodenpyle, 2006)。为此, 具有高自我监控人格的个体更倾向于根据环境以及交往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且更喜欢嵌入不同的网络, 并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而不是展示真实的自我(Snyder et al., 1983)。根据相似吸引理论(similarity-attraction theory)可知, 相似的个体更容易建立关系连带。担当媒介者的个体需要既能与群体 A 保持相似性, 又需要与群体 B 保持相似性, 这就要求个体具有很强的角色转换能力。因此, 自我监控人格与中心性、结构洞占取显著正相关。

2.2.3 文献评述

现有研究中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研究框架不完整, 欠缺对中介机制及情境因素调节作用的考虑。Baldwin (1992)提出可以用动力交互作用框架来解释人格与个人社会网络关系特征之间的转换。这种视角假定人格决定了个人所处的环境(Lewin, Heider, & Heider, 1936)。但是反向研究网络特征对人格的影响时则会发现该视角限制颇多。Klein 等(2004)提出从社会交换理论和相似吸引理论的视角出发研究人格对程度中心性的影响。根据社会交换理论, 假定人格决定了个体对获得某种网络收益和成本的评估, 从而决定了个体对所拥有网络的选择。此外, 以相似吸引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则认为在学历、性格等方面相似的人之间有更强的吸引力, 且更容易建立关系。遗憾的是在以往研究中上述的三种

中介机制都只是惊鸿一瞥,不是主要的论述内容,也没有实证研究对其进行验证。另外,Kadushin (2002)对个体建立社会网络的动机进行了研究,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动机,分别是追求安全感(safety)和追求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安全感与网络的凝聚力有关,而个人自我效能则主要产生自网络的分离以及与结构洞相对应的桥的位置。

并且,现有研究大多从个体微观视角出发,缺乏对影响网络特征的宏观和中观层面因素的思考。以往研究的控制变量大多为性别、学历、年龄、进入某一群体的时间、地理距离等个人因素(Kalish & Robins, 2006; Roberts et al., 2008; Pollet et al., 2011; Oh & Kilduff, 2008; Bosker et al., 2008; Sasovova et al., 2010)。但是组织整体网络特征、领导风格、行业、组织文化等集体结构或场力因素都会同时影响个人的关系以及个人的网络位置。在这一类型的研究中,个人社会网络特征的主要自变量仍是个体个性特征,但集体因素和场力可作为个体到个体的因果链上的干扰变量。场力不仅包括组织文化等中观层面的因素,还应该涵盖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体制、技术、宗教、历史、文化等因素。此类研究常用的方法是 HLM 模型。15 篇核心文献中虽然只有 Klein 等(2004)在探索人格特质对中心性的影响时用到了 HLM 模型。但随着 HLM 模型的推广,此类题目将会成为社会网络研究的重要热点。

第二,欠缺个性特征对社会网络交互作用的研究。人的行为必然同时受到多种个性特征的影响。这些共同影响也会反映在个体的社会网络特征上。例如高外向性人格的人也许在开放性上得分也较高,这样的个体既拥有高外向性人格的表征行为又拥有高开放性人格的表征行为,所以可能会有较大的社会关系规模,但由于开放性的影响却不能占据其所在网络的中心。

第三,缺乏交互、双向影响的研究视角。从研究思维模式的多元化出发,本文认为,现有研究缺乏对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间关系的双向动态思考。根据所掌握文献计算得出 93.3%的现有文献是单向作用视角下的研究。传统人格特质理论认为人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Allport, 1962)。随着年龄增长,个性特征会趋于稳定。但是,青少年时期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却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人格的发展与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许惠英, 2001)。其中社会网络就是每个个体都需要面对的重要的社会环境。根据 Blatt 和 Blass (1996)提出的人格形成模型可知,青少年的人格建立包括人际关系定位过程与自我定义过程。一方面青少年渴望建立亲密、稳固、有利于自我培养和提供安全感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建立一致、独特、稳固、现实和积极自我感觉的需要。在两个过程的交互作用中个体逐渐形成了趋于稳定的人格(Blatt & Blass, 1996)。可见,青少年社会网络的建立是人格形成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时期的个体会为了在自己的群体中建立亲密、稳定而又安全的关系来调整自己的所思所行。与此同时,他又会为了保持独立性,进一步调整自我定位。这两个过程反复发生,直到该个体逐渐形成稳定的个性特征。所以,本文大胆推测青少年的个性特征会受到行动者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是一个非线性的世界,社会网络结构与行动是互为因果的。青少年的社会网络特征也对其人格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第四,人格特质与社会网络特征间的关系欠缺中国情境下的思考,且缺少基于中国人人格、关系以及圈子的系列研究。以往大部分研究都只关注人格特质的某几个维度对社会网络特征的影响。例如,73.3%的研究是关于外向性人格的,53.3%的研究是关于神经质性人格的。被忽略的人格特质维度也会对社会网络特征产生影响(Klein et al., 2004; Asendorpf & Wilper, 1998; Bosker et al., 2008)。宜人性、责任性在以往的研究中极少受到关注,即便在某些研究中谈及它们,也只是一笔带过。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交往中,由于脸面观的影响,中国人都不愿与人撕破脸皮,更愿意维持表面上的亲密无间,并把这种表面上的亲密看作是一种给对方面子的行为(翟学伟, 2011)。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也许更看重宜人性这样与冲突频率负相关的人格维度。此外,家庭成员、拟似亲人以及熟人是中国人的主要社会资本来源(罗家德, 2012)。且圈内成员又可以吸收自己的熟人加入圈子(罗家德, 2012),促使圈内人与圈外人结识并进行人情交换,建立信任,进而扩展圈内人的熟人网络。所以,与家人保持较高交流频率的高责任性人格的中国人往往会结识更多的熟人,并产生更多的人情交换,进而拥有

更多更强的关系连带。由于隐藏个人意见和遵守传统规范可以积累声誉,带来人脉,在长期更符合个人利益(罗家德,2012)。所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高自我监控人格的个体更易获得更高的中心性。但是这种影响同时会受到内层圈子集体主义文化的约束,过高自我监控人格的人会被看作社交圈中的“变色龙”,难以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只有适度的自我监控人格个体才能在社交圈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圈子是烙有中国儒家伦常思想与道家阴阳之道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网络。圈子的独特文化特性使得现有的西方社会网络理论不能完全诠释中国人的圈子与关系。首先,中国人的关系与社会连带不同。对中国人来说关系不是统一的概念,关系是差序格局的,随远近不同有不同的交往模式(费孝通,1998)。对家人和拟似家人,中国人采取“需求法则”(Hwang, 1988)。在拟似家人的小圈子内,中国人被要求是集体主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而熟人关系采用“人情法则”(Hwang, 1988),“报”与“义”是熟人的行为道德标准,其要求人满足熟人需要,但这种人情却是要还的。另外,生人关系则采用“公平原则”(Hwang, 1988),“就事论事”、“法不容情”。第二,社会网络理论中的连带强度不能用以评估中国人所有圈子中的关系。血缘亲疏是家人圈子中关系的主要评判标准(罗家德,2010),即使互动很少、亲密程度低,但血浓于水,家人优先,这是连带强度无法充分解释的。第三,中国人关系背后有双重信任机制(罗家德,2012)。圈子内的家人关系和熟人关系不仅仅依靠个体间自有关系特点来加以维系,更依靠儒家思想中的“伦常”“义气”“恩报”这样的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第四,圈子有着独特的结构特质。圈子结构的中心性很高,且边缘界定模糊,规模弹性很大。圈内人员关系亲密但是地位不平等。差序格局的人脉关系网总是以人为中心,使得圈子里总有“能人现象”,即一个圈子总是一个能人动员其熟人,核心熟人再动员他们的熟人,逐步扩大而组成(李志超,罗家德,2011,2012)。第五,圈子形成过程中,中国人寻求认同的依据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寻求认同是基于宗教、地域、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这类比较抽象的标准,而中国人更强调的是人的因缘(罗家德,2012)。中国人讲究九同,即同学、同事、同乡、同姓、同行、同好、

同年、同胞以及同宗(罗家德,2011)。这种依据有一种“因缘命定,顺其自然”的道家风范。

与此同时,由于现存的各类语言、文化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常常被忽略。因此,国内学者开始从中国的语言文化入手研究中国人的人格。王登峰等学者在对中国人的词汇研究时发现:①中国人的人际行为维度是“半周环”模型,与西方学者的“周环模型”不同;②评价性词汇所占比例高,反映了中国人注重评价而非客观反映的特点;③在描述稳定人格特质的术语中,个人指向的最多,而且在对目标任务进行描述时尤为显著,反映了中国人对个人自我特点的极大关注;④中国人在认识事物时,“综合”重于“分析”;⑤中文人格形容词远少于英语,说明中国人的描述都是综合性的和评价性的,很少对具体行为特点做出描述(王登峰,崔红,2000),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强调本土化的中国人大七人格量表。该量表包括七个维度:外向性、善良、情绪性、才干、人际关系、行事风格以及处事态度(王登峰,崔红,2004)。另外,张妙清等学者也提出了不同于完全本土化的研究思路,即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跨文化人格研究。他们提出普遍的人格特质是存在的,但针对身处具体的文化背景中的人群而言,其同特殊性糅合在一起(张妙清,范为桥,张树辉,梁觉,2008),并开发了包括个人导向特征、关系导向特征、团体导向特征和他人导向特征四个维度的CPAI量表。后三种导向正是就西方人格理论对人格特质人际关联维度忽略的补充(范为桥,张妙清,张建新,张树辉,2011)。第一个导向则反映了普遍存在的人格特质。中国人人格中的关系维度与中国人关系、圈子的建立息息相关。但现有研究却忽视了中国人人格与中国人圈子的文化特殊性,这是已有研究的明显不足。

第五,数据收集方法有待改进。以往的研究都依赖调查问卷和单一受访者来收集数据。这会导致多种问题。首先,问卷调查可能会受到受访者理解能力和认知倾向的影响,且社会网络特征的调查问卷一般较为复杂,许多受访者都不能很好地完成填写工作。其次,从问卷所得到的社会网络信息本身就受到了受访者对于网络特征感知能力的影响,网络特征的感知能力又受到个性特征的影响,这样就放大了个性特征对真实网络特

征的影响作用(Casciaro, 1998)。而且无论个体处在网络的什么位置, 个体的认知都无法准确反映网络的真实情况, 可能受到同源方差问题的影响。此外, 关于个性特征对个人社会网络关系特征的影响研究都采用了学生样本, 样本的代表性不高, 会降低研究的外部效度。

3 未来研究的启示

虽然过去对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但是以往研究仍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不足。在研究内容方面, (1)研究框架欠缺对中介机制、情境因素调节作用的考虑; (2)缺乏个性特征对社会网络交互作用的思考; (3)缺乏交互、双向影响的研究视角, 将人格与社会网络的关系看作呆板的单向影响关系; (4)对中国情境下应该被关注的人格特质重视不足, 且缺少基于中国人人格、关系和圈子的系列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 以往的研究都依赖调查问卷和单一受访者来收集数据。所以, 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 完善现有研究框架, 在现有研究框架中加入中介机制、个性特征对社会网络交互作用以及情境因素调节作用的思考。未来研究应该探索个性特征会否通过安全感(Kadushin, 2002)、相似性(Klein et al., 2004)、自我效能(Kadushin, 2002)和关系受益(Klein et al., 2004)作用于个人社会网络特征。并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对比各种中介机制的解释水平, 选择解释水平最优中介变量进行理论发展。同时, 研究者也应该考虑各中介机制的解释水平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此外, 现实生活中任何结果都不可能只受到单一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过去的相关研究常常将非主要关注的影响因素当作控制变量进行处理。然而在真实的个人行为中, 个体无法排除任何一个个性特征对他的影响。所以, 讨论个性特征的交互作用对社会网络特征的影响更具有实践意义。使用交互模型来探索个性特征对社会网络特征的影响能够大步推进该研究领域的发展, 使研究结论更具有可操作性。在交互模型中, 各个性特征变量通过交互作用, 对网络特征形成过程产生影响, 进而决定了网络最后呈现的特征。

此外, 中观和宏观层面因素作为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间因果链上的干扰变量在宏观视角

下影响二者的双向作用过程。目前为止, 多数研究都从静态角度出发探索了个人层面上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之间的关系。但是中观层面(行业、职业、公司环境、整体网络特征、领导风格等)与宏观层面(政治经济体系、技术、历史、宗教等)的因素也会同时影响个人的关系特征以及结构位置。社会网络理论中的结构洞也是强情景化研究的代表案例, 有着开放市场、自由竞争和个人主义取向的西方情景是结构洞理论的基础(Burt, Hogarth, & Michaud, 2000)。在有着类似市场文化的市场和组织中, 占据结构洞的掇客可能会如鱼得水。然而在集体主义取向的环境中, 人们却更看重那些和情景核心价值观一致的行为。在合作的环境中, 个人中心网中的结构洞则可能会对其事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Xiao & Tsui, 2007)。静态层面的未来研究也可以进一步验证神经质性人格与社会网络特征各维度之间的关系。

其次, 针对青少年探索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的动态共变关系。根据 Blatt 和 Blass (1996)提出的人格形成模型, 青少年的人格形成会在建立亲密、稳固、有利于自我培养和提供安全感的关系以及确立一致、独特、稳固、现实和积极的自我感觉这两个过程中完成。学校环境中的学生群体这一因素对学生的人格形成不容忽视。学生群体, 即青少年学生所拥有的校园社会网络。不同的学生群体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和谐的群体能使学生产生安全感、力量感, 增加自信、自尊, 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发展。反之, 在一个散乱的群体中, 往往会蔓延对学生人格成长不利的慵懒怠惰、不思进取、嫉贤妒能等不良倾向(许惠英, 2001)。另外,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 复杂性的自组织维度描述了个体根据外部环境进行的不同方式的自主调整。社会网视角既不把个体看作是彼此无关联的自由原子人, 也否认人在社会中是处于无自主选择的牢笼状态。根据网络动态学, 社会网结构与行动是互为因果的, 个体行动会“自组织”出社会网结构, 社会网又会产生集体行动与场力来约束个体的行为(罗家德, 2010)。对于成年人来说, 通过对集体行动和约束性场力的判断, 成年个体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并且展现不同的行为(罗家德, 2010)。但是对于青少年而言, 集体行为与个人关系多寡对其个性特征的形成却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Shahar, Henrich, Blatt, Ryan, &

Little, 2003)。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青少年个性特征形成与网络特征之间也许存在一个双向影响的机制。由于复杂性系统中的“反馈效应”,个人的行为会强化个人中心网与整体网络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又形成个体所面对的环境,青少年个体根据环境进行关系定位与自我定义。这样的双向过程推进了整体网络特征和青少年人格特质的形成与深化。由于人格发展的研究往往耗时达二十几年,所以建议未来研究可以长期观察从中学开始形成的小群体以及其成员个性特征的发展。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把一起长大的一群人称为“发小”。这样的群体一般从个体青少年时期开始建立,并且维持时间很长,有的甚至持续了一生之久。这些群体陪伴个体度过了完整的青少年时期。所以,观察“发小”群体的网络特征变化与成员个性特征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研究青少年个性特征形成与网络特征间双向影响机制的可行途径。

第三,结合中国特色对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间关系展开本土化研究。这一思路又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使用西方情景下的个性特征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研究中国情景下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的关系。突破西方只看重外向性、神经质对社会网络特征影响的惯性思维,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大胆寻找对社会网络特征可能产生影响的其他个性特征变量。具体来说,未来研究应该从中国人的脸面观以及家族观念的视角出发,多关注被忽略的宜人性、责任性这两个人格维度对中国人社会网络特征的影响。当然,在小心求证这些假设的过程中研究者可能会受到中国文化研究缺乏系统性、操作性等缺陷的约束,但是随着中国本土化研究的发展与成熟,宜人性、责任性这两个人格维度对中国人社会网络特征的影响会成为本土化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第二,建立中国情景下的本土理论。具体说来,即借鉴西方人格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在中国人人格、关系和圈子的基础上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世界上所有种族被“彻底大换血”是可能发生的,但中国人的人格与关系的独特之处短期内不会消失。在现有人格及圈子的研究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索中国人人格与中国人圈子的关系。首先,分圈层地探讨人格特质对关系特征的影响。中国人的关系是差序格局的,随远近不同有不同的交往模式,所以对中国人来说

关系不是统一的概念(罗家德,2012)。三个圈层中人格特质与社会网络特征间的关系不能放在一起同时比较。未来可以分圈层探索中国人人格对同一圈层中关系特征的影响。其次,回顾中国历史,中国人都在学习如何跨越圈层,建立圈子,获得权力。由于中国人圈子的灵活性,中国人可以在圈层之间通过人情交换进行跳跃。未来可以关注中国人人格对中国人跨越圈层能力的影响。此外,人格对关系脱耦与耦合能力的影响也是有价值的未来研究方向。

最后,丰富研究方法。对于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是其中却极少有研究对方法的创新给予关注。根据已掌握文献计算得出93.3%的研究采用了单一受访者的问卷调查法。以下内容我们将就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提供几点建议:(1)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首先,未来研究有必要通过其他数据来源证实通过调查问卷所获得的数据(Huber & Power, 2006)。例如,对真实的网络特征进行日记式的记录,或者安排观察者在被访者身边记录被访者的网络特征信息,并与问卷所得信息进行比对。此外,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之间的动态作用过程极具复杂性,而需要采用能够考察复杂性的研究方法。案例研究由于其能掌握现象的丰富性,能对现象进行厚实的描述(Tsui, 2007),而成为恰当的方法之一。未来对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之间关系的研究可能主要聚焦在二者如何相互影响变化这一主题上。如果研究的目的在于回答“如何变化”这一问题,案例研究则是最适合的方法;(2)探索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间的曲线关系。传统上,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大都依赖线性模型或线性评估技术。但是,对于大部分常用的概念而言,它们所探讨的关系只是在相对很窄的范围内才是线性的(Rajagopalan, Rasheed, & Datta, 1993)。如果个性特征与网络特征之间是一个双向影响机制,我们认为二者之间应该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用“二分法”将人格维度的得分简单地分为高低两种水平将不再适用于未来非线性关系的研究;(3)多层次关系理论模型的建立与验证。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组织的整体网络特征会在更高的层面对个人的网络特征产生干扰作用。以往研究在检验主要效应和调节效应时,主要采

用双变量、零阶层、偏相关、方差分析技术和结构方程建模。未来还需要更为复杂的分析方法来评价多层次理论模型。这类方法包括 HLM 模型、层次回归分析等。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可以采用 HLM 模型考察高层变量(如组织的整体网络特征、社会文化环境等)对预测底层因变量(如个人的网络特征)的影响,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考察组织的整体网络特征、社会文化环境在控制了个人个性特征的影响之后的增值贡献。

4 结论

综上所述, 对以往研究的回顾表明, 在过去的 26 年中, 围绕个性特征对社会网络特征影响的研究十分有限。但是这些有限的文献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本文通过系统性回顾发现以往研究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不足。在研究内容方面, (1)研究框架欠缺对中介机制、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的考虑; (2)缺乏个性特征对社会网络交互作用的思考; (3)缺乏交互、双向动态影响的研究视角, 将人格与社会网络的关系看作呆板的单向影响关系; (4)对中国情境下应该被关注的人格特质重视不足, 且缺少基于中国人人格、关系和圈子的系列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 以往的研究都依赖调查问卷和单一受访者来收集数据。未来研究启示部分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了完善现有研究框架和丰富研究方法的具体建议。此外, 为弥补对未来研究有重大影响的(3)、(4)两点不足, 基于结合复杂性理论与青少年人格发展模型提出青少年个性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双向影响、动态共变。并提供了关于中国人人格与中国人圈子间关系的本土化研究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 白璇, 李永强, 赵冬阳. (2012). 企业家社会资本的两面性: 一项整合研究. *科研管理*, 33(3), 27-35.
- 范为桥, 张妙清, 张建新, 张树辉. (2011). 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研究: CPAI 及其跨文化应用. *心理学报*, 43(12), 1418-1429.
- 费孝通. (1998). *乡土中国*.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罗家德. (2010). *社会网分析讲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罗家德. (2011). 圈子文化的市场力量. *商界评论*, (5), 40-44.
- 罗家德. (2012). 关系与圈子——中国人工作场域中的圈子现象. *管理学报*, 9(2), 165-178.
- 李智超, 罗家德. (2011). 透过社会网观点看本土管理理论. *管理学报*, 8(12), 1737-1747.
- 李智超, 罗家德. (2012). 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特质——一个社会网的观点. *社会科学战线*, (1), 159-164.
- 王登峰, 崔红. (2000). 文化、语言、人格结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 37(4), 38-46.
- 王登峰, 崔红. (2004). 中国人的人格特点与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 与 QZPS-SF)的常模. *心理学探新*, 24(4), 43-51.
- 许惠英. (2001). 环境与青少年人格发展.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2), 11-14.
- 张妙清, 范为桥, 张树辉, 梁觉. (2008). 跨文化(中国人)个性测量表——青少年版(CPAI-A)的香港标准化研究——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测量. *心理学报*, 40(7), 839-852.
- 翟学伟. (2011). *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Allport, G. (1962). The general and the unique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0(3), 405-421.
- Asendorpf, J. B., & Van Akin, M. A. G. (1994). Traits and relationship status: Stranger versus peer group inhibition and test intelligence versus peer group competence as early predictors of later self-esteem. *Child Development*, 65(6), 1786-1798.
- Asendorpf, J. B., & Wilpers, S. (1998). Personality effects on soci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6), 1531-1544.
- Brass, D. J. (1984). Being in the right place: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individual influence in an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9(4), 518-539.
- Brass, D. J., & Burkhardt, M. E. (1992). Centrality an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In N. Nohria & R. Eccles (Eds.),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pp. 191-215).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Brass, D. J., & Krackhardt, D. (1999). The social capital of twenty-first century leaders. In J. G. Hunt & R. L. Philips (Eds.), *Out-of-the-box leadership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army*, (pp. 179-194). Amsterdam: Elsevier B.V.
- Brass, D. J., Galaskiewicz, J., Greve, H. R., & Tsai, W. (2004). Taking stock of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6), 795-817.
- Bouchard, G., Lussier, Y., & Sabourin, S. (1999). Personality and marital adjustment: Utility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1(3), 651-660.
- Blau, J. R., & Alba, R. D. (1982). Empowering nets of particip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7(3), 363-79.
- Baldwin, M. W. (1992). Relational schemas and the processing of social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2(3), 461-484.
- Bolger, N., & Eckenrode, J. (1991). Social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and anxiety during a major stressful event.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3), 440–449.
- Bosker, R. J., Doeven-Eggens, L., De Fruyt, F., Hendriks, A. A. J., & Van der Werf, M. P. C. (2008). Personality and personal network typ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5(7), 689–693.
- Burt, R. S., Jannotta, J. E., & Mahoney, J. T. (1998).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structural holes. *Social Networks*, 20(1), 63–87.
- Burt, R. S., Hogarth, R. M., & Michaud, L. (2000). The social capital of French and American managers. *Organization Science*, 11(2), 123–147.
- Blatt, S. J., & Blass, R. B. (1996). Relatedness and self definition: A dialectic model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G. G. Noam & K. W. Fischer (Eds.), *Development and vulnerabiliti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Hillsdale: Erlbaum.
- Baker, W. E., & Faulkner, R. R. (1993).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onspiracy: Illegal networks in the heavy electrical equipment indus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6), 837–860.
- Cross, R., & Cummings, J. N. (2004). Ties and network correlates of individual performance in knowledge intensive 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6), 928–937.
- Casciaro, T. (1998). Seeing things clearly: Social structure, personality, and accuracy in social network perception. *Social Networks*, 20(4), 331–351.
- Ginsberg, A., & Venkatraman, N. (1985). Contingency perspectives of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0(3), 421–434.
-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 Granovetter, M. S. (1982).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In P. V. Marsden & 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pp. 105–130). Beverly Hills: CA.
- Huber, G. P., & Power, D. J. (2006). Retrospective reports of strategic-level managers: Guidelines for increasing their accurac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6(2), 171–180.
- Hwang, K. K. (1988). *The Chinese power game*. Taipei: Linkingbooks.
- Henderson, S. (1977). The social network, support and neurosis: The function of attachment in adult lif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1(2), 185–191.
- Ickes, W., Holloway, R., Stinson, L. L., & Hoodenpyle, T. G. (2006). Self-monitor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 The centrality of self-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4(3), 659–684.
- Kadushin, C. (2002). The motivational foundation of social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24(1), 77–91.
- Krackhardt, D., & Porter, L. W. (1985). When friends leave: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rnover and stayers' attitud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0(2), 242–261.
- Krackhardt, D., & Porter, L. W. (1986). The snowball effect: Turnover embedded i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1(1), 50–55.
- Krackhardt, D. (1990). Assessing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Structure, cognition, an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5(2), 342–369.
- Klein, K. J., Lim, B. C., Saltz, J. L., & Mayer, D. M. (2004). How do they get there? An examination of the antecedents of centrality in team network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6), 952–963.
- Kalish, Y., & Robins, G. (2006). Psychological predispositions and network struc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predispositions, structural holes and network closure. *Social Networks*, 28(1), 56–84.
- Lewin, K., Heider, F., & Heider, G. M. (1936). 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 Retrieved July 3, 2013, from <http://psycnet.apa.org/psycinfo/2004-16277-000>.
- Lin, N., Ensel, W. M., & Vaughn, J. C. (1981).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 of ties: Structural factors in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4), 393–405.
- Mehra, A., Kilduff, M., & Brass, D. J. (2001). The social networks of high and low self-monitors: Implications for workplace performan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6(1), 121–146.
- Morrison, E. W. (2002). Newcomers'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 ties during social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6), 1149–1160.
- McPherson, J. M., Popielarz, P. A., & Drobnic, S. (1992). Social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2), 153–170.
- Marsden, P. V., & Hurlbert, J. S. (1988). Social resources and mobility outcomes: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Social Forces*, 66(4), 1038–1059.
- McCrae, R. R., & Costa, P. T. (1987). Validation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cross instruments and observ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1), 81–90.
- Oh, H., & Kilduff, M. (2008). The ripple effect of personality on social structure: Self-monitoring origins of network brokerag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5), 1155–1164.
- Provan, K. G., Fish, A., & Sydow, J. (2007).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t the network level: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whole networks. *Journal of Management*, 33(3), 479–516.
- Pollet, T. V., Roberts, S. G. B., & Dunbar, R. I. M. (2011). Extraverts have larger social network layers. *Journal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2(3), 161–169.
- Russell, D. W., Booth, B., Reed, D., & Laughlin, P. R. (1997). Personality, social networks, and perceived social

- support among alcoholics: A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5(3), 649–692.
- Raab, J., & Milward, H. B. (2003). Dark networks as problem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3(4), 413–439.
- Rotter, J. B. (1966).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80(1), 1–28.
- Roberts, K. H., & O'Reilly, C. A. (1979). Some correlates of communication roles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2(1), 42–57.
- Rajagopalan, N., Rasheed, M. A. A., & Datta, D. K. (1993). Strategic decision processes: Critical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2), 349–384.
- Roberts, S. G. B., Wilson, R., Fedurek, P., & Dunbar, R. I. M. (2008).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personal social network size and structur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4(4), 954–964.
- Shahar, G., Henrich, C. C., Blatt, S. J., Ryan, R., & Little, T. D. (2003).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self-definition, and their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9(3), 470–483.
- Sarason, I. G., Levine, H. M., Basham, R. B., & Sarason, B. R. (1983). Assessing social support: The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1), 127–139.
- Sangster, J. K., & Ellison, C. W. (1978). Mental illness, loneliness, and helplessness: A challenge for research and therapy. *Mental Health and Society*, 5(5–6), 284–295.
- Stokes, J. P. (1985). The rel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variables to loneli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4), 981–990.
- Snyder, M., Gangestad, S., & Simpson, J. A. (1983). Choosing friends as activity partners: The role of self-monitor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5), 1061–1072.
- Swickert, R. J., Rosentreter, C. J., Hittner, J. B., & Mushrush, J. E. (2002). Extraversion, social support processes, and stres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2(5), 877–891.
- Sparrowe, R. T., & Liden, R. C. (1997). Process and structure in leader–member exchan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2(2), 522–552.
- Seibert, S. E., Kraimer, M. L., & Liden, R. C. (2001). A social capital theory of career succ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4(2), 219–237.
- Sasovova, Z., Mehra, A., Borgatti, S. P., & Schippers, M. C. (2010). Network Churn: The effects of self-monitoring personality on brokerage dynamic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5(4), 639–670.
- Tsui, A. E., & O'Reilly, C. A. (1989). Beyond simple demographic effects: The importance of relational demography in superior–subordinate dyad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2(2), 402–423.
- Tsui, A. S. (2007). From homogenization to pluralism: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in the academy and beyond.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6), 1353–1364.
- Vaux, A. (1988). *Social support: Theor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 Wegener, B. (1991). Job mobility and social ties: Social resources, prior job, and status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1), 60–71.
- Xiao, Z. X., & Tsui, A. S. (2007). When brokers may not work: The cultural contingency of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high-tech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2(1), 1–31.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Network: Its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LI Yongqiang; HUANG Yao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31110, China)

Abstract: After reviewing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n social network, we found that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1)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n social network,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context variables and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n social network; (2) the dynamic and covari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network; (3) the uniqu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n Chinese context, especially characteristics about Chinese personalities and “Quan-Zi”.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localized personality theory and social network research,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localization and covari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network.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Big Five’ personality; Quan-Zi; Chinese personality